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中韩关系史

(近代卷)

徐万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D8-7.712.6
1

0102780

DH54/0/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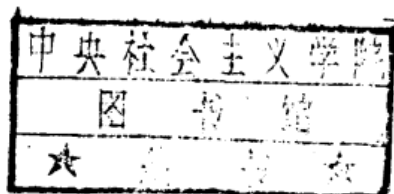
中韩关系史

近代卷

徐万民 著



2010278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275010

中韩关系史

近代卷

徐万民 著

责任编辑:屠敏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管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5 印张 264 千字

印数 0001-1000

1996年12月第一版 199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837-4/K·117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字学术财团支援刊行

前 言

近代中韩关系史始于19世纪60年代，终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中韩两国联合抗击日寇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是近代中韩关系史的基本内容。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休戚与共，患难相助，用生命和鲜血浇铸的万古不朽的友谊丰碑，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中韩两国人民联合抗日的道路是曲折的。一方面，传统的宗藩关系已难以适应抵抗近代殖民侵略的需要，必须加以扬弃，重新构造完全平等的新关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阴险目的，千方百计离间中韩关系，在两国人民合作抗日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上述因素，都曾对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造成消极的影响。当然，这些消极的东西始终不曾成为近代中韩关系的主流。

在中韩两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都有共产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的区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民族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抛头颅，洒热血，均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令后代子孙永远难以忘怀的贡献。

历史一再证明，中韩两国的命运是相同的。过去，我们共同遭受日寇侵略和奴役的惨祸，共同经历了民族复兴的艰难岁月，共同分享了胜利的喜悦，又都备尝了战后民族分裂的痛苦。现在，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我坚信，在21世纪，一个统一的繁荣富强的中国和一个统一的繁荣富强的韩国将并肩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必将发展到更高的境

界。鉴古可以知今，知未来。我正是怀着对 21 世纪中韩友好的美好愿望，来追溯近代中韩关系史的。

和许多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前辈学者相比，我对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只能是刚刚入门。1993 年，韩国教育家、历史学家金俊烨博士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金教授当年是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将军麾下的一名青年军官，中韩合作抗日的历史见证人。他以感人至深的讲演，回顾了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缔造中韩友谊的艰难历程，给作者以深刻的启迪。同年，在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下，我开始涉足近代中韩关系史研究。1994 年，在韩国高丽大学讲学期间，承蒙东洋史学系李春植教授、辛胜夏教授、朴元熈教授的多方关照，使我搜集到许多有关中韩关系史的宝贵史料。本书写作过程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宋成有先生、徐勇先生热情帮助。我的两个学生片忠范（韩国）、王生怀搜集和翻译了不少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陆象淦先生、屠敏珠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谨一并致谢。

徐万民

1995 年 12 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日寇征韩与中韩传统关系的变化	(1)
第一节 中韩合作因应欧美列强	(1)
第二节 中国与朝日江华条约	(8)
第三节 李鸿章建议朝鲜以夷制夷	(17)
第四节 中国与壬午兵变	(24)
第五节 中国与甲申政变	(32)
第二章 甲午战前十年中朝宗藩关系的强化	(42)
第一节 强化政策的选择与实施	(42)
第二节 中朝关系的波折	(53)
第三节 中朝经济关系的发展	(70)
第三章 甲午战争与宗藩关系的终结	(81)
第一节 金玉均上海遇刺案	(81)
第二节 日本胁迫朝鲜与中国为敌	(85)
第三节 战时中朝关系	(96)
第四节 马关议和与朝鲜独立	(116)
第四章 大清国与大韩国	(119)
第一节 中韩外交关系的建立	(119)
第二节 中国与日本统监治下的韩国	(126)
第三节 延吉界务争端	(138)
第四节 日本亡韩与中国之强烈反应	(148)
第五章 日韩合并初期的中韩关系	(155)
第一节 韩国成为日本侵华基地	(155)
第二节 中国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根据地	(165)

第六章 中华民国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76)
第一节 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	(176)
第二节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	(183)
第三节 韩国独立军在东北.....	(196)
第四节 韩国问题与中日外交.....	(200)
第七章 中朝联军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216)
第一节 东北抗日义勇军.....	(216)
第二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	(230)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	(239)
第八章 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	(265)
第一节 局部抗战时期的中韩合作.....	(265)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韩合作.....	(277)
第三节 韩国志士在中国解放区.....	(299)
第四节 韩国友人凯旋回国.....	(306)
附录一 大事年表	(317)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25)

第一章

日寇征韩与中韩传统关系的变化

第一节 中韩合作因应欧美列强

两个衰败的王朝

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变，揭开了近代中韩关系史的帷幕。

首先，是两国政权的转换。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朝鲜国王派遣使团到北京慰问。咸丰皇帝大为感动，但又不愿让朝鲜使臣见到他的狼狈相，便谕使臣到京后无庸前赴行在，礼部仍照例筵宴，并赐如意、缎疋、瓷器、漆器。^①

1861年8月，咸丰病逝，年方6岁的载淳继位。11月，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和咸丰的皇后慈安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罢免了咸丰任命的顾命八大臣，改元“同治”。时年26岁的慈禧太后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垂帘听政、训政生涯。同治皇帝（1862—1874）、光绪皇帝（1875—1908）都是在她控制下的傀儡。这一时期，涉及中朝关系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她的主持下制定的。1862年，慈禧任命年仅40岁的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870年又提拔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直隶25年，成

^① 《清史稿》（48），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594页。

了在中央政府指导之下直接处理中韩关系的最重要的政府大员。同治元年，在中韩关系史上起过显要作用的袁世凯，还只是河南项城农村的一名3岁顽童。

同治二年（1863年），朝鲜哲宗病逝。因哲宗无嗣，王族支系李是应次子李熙继承大统，是为高宗（1864—1907）。高宗即位时，年仅12岁，由赵大妃垂帘听政。赵大妃并不直接干政。一切军国大事由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执掌。1866年，赵大妃宣布取消垂帘听政，还政于国王。但是，高宗亲政只是名义，实权依然归大院君掌握。高宗的王妃闵妃1866年受封时年仅16岁，她与大院君争夺权力，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中朝关系自然要受这种政争的消极影响。

清朝和李朝都是日趋衰败的末代王朝。在两个行将灭亡的王朝内部，又都出现了后妃和外戚长期干政的腐朽政治。这是中、朝两国的不幸，两国人民的不幸。

清朝标榜的同光中兴和李朝大院君的改革，都没有挽回衰落的国运。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迎来了列强对传统的中朝关系的挑战。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朝两国均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801年，朝鲜国王镇压天主教，并要清政府饬令沿边大吏严查究办漏网分子。嘉庆皇帝命“沿边大吏一体严查，设经盘获，即发交国王自行办理。”^① 1832年，英国间谍船阿美士德号自澳门出发，侦察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口岸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在威海停留一天后，又折往朝鲜，侵入群山港。朝鲜国王报告说：“英吉利商船驶入朝鲜古代岛，要求通市，严拒之，相持旬余，英船始去。”^② 道光皇帝奖其忠，赐缎匹。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国通商，但仍支持朝鲜闭关锁国。

① 《清史稿》（48），第14591—14592页。

② 同上书，第14593页。

1845年，礼部奏：“据朝鲜国王咨称，英船屡泊其境，量山测水，并问答中有交易之词。”^①道光皇帝命两广总督耆英详询英使，遵照成约，婉言开导，不得复任兵船游弋，致滋惊扰。

闭关锁国并不妨害任何国家的利益。朝鲜政府对落难夷人，慷慨救助，无愧于“礼义之邦”的美名。1855年，四名遇难美国水手漂泊到朝鲜海岸被救。朝鲜国王专差护送四人到北京。礼部奏请照护送朝鲜难夷之例，由兵部将其递解到常州，由两江总督怡良发交苏松太道查办。1856年2月14日，怡良奏：“奴才查花旗即咪利坚，上海地方有夷目管理该国通商事务，已飭令将该难夷等交该国夷目保领，听其附便回国，以副圣天子怀柔远人（之）至意。”^②

法、美侵朝与清政府消极应付

1787年，由两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远东探险队，侵入朝鲜济州岛和郁陵岛一带，测量东南沿海的航道。从1835年起，法国传教士开始潜入朝鲜传教。1846年和1847年，在天主教传教士的直接引导下，法国两次入侵朝鲜。1847年，三艘法国军舰侵入忠清道洪州外烟岛和古群山薪峙岛附近，以1839年法国传教士被害事件为借口，进行武力威胁，强行要求通商。后因船只触礁而不得不折回。1851年，法国商船侵入济州岛大静县。1855年，法国军舰两次侵犯朝鲜领海，对从釜山到图们江口的海岸线进行了测量。1856年，数百名法国士兵搭乘军舰在洪州古代岛前面的长古岛登陆，鸣枪开炮，烧杀抢掠。这群海盗又窜到黄海道丰川沿岸作恶。

1866年1月，大院君下令全国进行大搜捕，几个月之内就在汉城及其它地方逮捕和处死了上万名天主教徒，9名法国神甫被斩首。从朝鲜侥幸逃出的法国神甫到达北京，向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和法国印度支那舰队司令罗兹告急。法人将问罪于朝鲜，

^① 《清史稿》（48），第1459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2），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6页。

又以朝鲜向为中国属国，于是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照会。总理衙门答复说中国无权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7月13日，法国向清政府严重抗议，声称：“法兰西皇帝陛下决不宽恕此种暴行，将派遣驻扎临近水域的舰队灭亡这个国家（朝鲜），废黜现国王，并依本国皇帝之敕令拥立新国王。既然朝鲜乃中国属邦，其内政外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则不许中国提出异议。”^①

清政府获悉朝鲜镇压天主教规模很大，感到事态严重，担心法国借机武力报复，就由总理衙门照会法国驻华公使，劝其不要仓促用兵，同时令礼部致函朝鲜政府，通报法国意向，劝其提前作好各种准备。9月1日，海军上将罗兹率三艘军舰，在法国神甫的指引下测量汉江下游水道，溯江而上，侵入汉城附近杨花津、西江。朝鲜军民严阵以待，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大院君派官员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加强汉江沿岸的防卫力量。法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太小，在测量航道和侦察地形之后，返回原出发地山东烟台。9月，7艘法国军舰载着2500余名官兵，再次侵入朝鲜，宣布封锁汉江下游和西海岸，并在江华岛和通津海岸登陆。朝鲜政府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法国军队在不断遭受损失后终于认识到，朝鲜决不是轻易能够征服的。他们抢劫、焚毁了江华城，于10月中旬退走。在朝鲜近代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丙寅洋扰”。

1866年6月，美国双桅帆船袭击号在朝鲜海岸遇难，船上的水手备受优待。7月，美国武装商船谢曼将军号侵入大同江，船上的水手扣押朝鲜官员，抢夺物资，凌辱妇女，开炮杀伤十余名无辜百姓。平壤附近的人民联合当地驻军，火烧敌船，歼灭了全部入侵的海盗。美国驻华公使就谢曼将军号事件向清政府提出质问。清政府回答：朝鲜虽奉中国正朔，宣战讲和，非我所得干涉。1867年1月，美国派出三等炮舰一艘调查谢曼将军号的下落，结果一无所获。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2。

1868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通知清政府：前年9月本国商船两只在朝鲜搁浅被害，尚余4人，请转知朝鲜，设法救护。清政府请朝鲜自行查明酌复。7月，美国派军舰侵入朝鲜海面，国王奏闻清政府。中国查明朝鲜并无扣押美人情事，致函美国驻华公使代为解释。美使乃无言，其军舰撤走。^①

1868年春天，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的美国人詹金斯伙同一普鲁士人和一法国神甫，发动了“对朝鲜的海盗式侵掠”。^②他们组织了一个120余人的大海盗集团，乘坐一艘武装商船，侵入德山郡，盗掘大院君生父南延君的陵墓。准备以骨骸要挟朝鲜政府答应赔款、通商、传教等条件。愤怒的朝鲜民众轰走了这群无耻的强盗。

1871年春，美国驻华公使请中国政府代转其致朝鲜函，预告将派军舰前往商办事务。清政府权宜许为转达。后接朝鲜政府咨文，言美国希望赴朝鲜调查船只遇难事，而朝鲜无残害美船之事，不能允准美国所请，并请中国政府降旨开导美国驻华公使。美国公使以降旨开导，是以属国相待，拒不接受。^③5月，美国公使斐迪、海军上将罗杰斯率领5艘军舰、1230名官兵侵入江华岛。朝鲜政府拒绝与美方谈判，只向他们送了一份朝鲜国王致清政府礼部咨文的副本。在咨文中，朝鲜国王要求清政府调解朝美纠纷。6月10日，美军攻占并破坏了江华岛上的5座炮台，打死打伤250多名朝鲜士兵。美军的损失也不轻。朝鲜政府仍拒绝谈判。汉城的大街小巷都树起斥和碑：“洋夷侵犯，非战即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④7月3日，美军退出朝鲜海面，入侵以可耻的失败

① 《清史稿》(16)，第4583页。

②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4页。

③ 《清史稿》(16)，第4584页。

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页。

告终。这次事件，在朝鲜历史上称之为“辛未洋扰”。

法、美侵略的失败，是朝鲜军民英勇抵抗的胜利，而来犯之敌力量相对弱小，其志在通商，非在吞并朝鲜国土，也是重要原因。大院君政府由此产生轻敌思想，继续坚持落后的锁国政策，使朝鲜民族失去自主开放的历史机遇。

欧美列强不明中朝宗藩关系的真相，及其与近代殖民关系的区别，期望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推广至中国的属国朝鲜。清政府不愿列强染指朝鲜半岛，再三声明“朝鲜内政外交向由自主”。这也符合中朝关系的实际状况。在宗藩关系的框架下，朝鲜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列强在中国享有的侵略特权，并不能自动在朝鲜生效。清政府在相信朝鲜政府能自主应付局势的前提下，以比较隐蔽的外交行动策应朝鲜政府的军事抵抗，并不是放任不管。但是，中朝两国以中世纪封建的宗藩体系因应近代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其弱点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中已初见端倪。

朝鲜饥民越垦延边

闭关锁国政策也包括对中朝边界和边境地区经济活动的严格管理。1637年（崇德二年），清政府定贡道由凤凰城出入。定边境互市规约：凡凤凰城诸处官员人等往义州市易者，每年定限二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宁古塔人往会宁市易者，每年一次。库尔喀人往庆源市易者，每二年一次。由部差朝鲜通事官二人，宁古塔官骁骑校、笔帖式各一人，前往监视，定限二十日即回。

1711年，康熙皇帝谕大学士曰：“长白山之西，中国与朝鲜既以鸭绿江为界，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东南入海，土门江西南属朝鲜，东北属中国，亦以江为界。但鸭绿、土门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悉。”^①于是，派穆克登往查边界。是年，穆克登至长白山，会同朝鲜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立碑小白山上。边界

^① 《清史稿》（48），第14585页。

既定，朝鲜政府下图们江封禁令，若有私渡江者处以极刑。

此后，中朝边境一带遂成飞禽走兽之自由天地，只有射猎采药及不堪贪官污吏迫害之亡命者，敢于冒禁私越。即凤凰城、宁古塔与朝鲜义州、会宁等处边境贸易，亦有严格的管理章程。大院君厉行销国期间，对经由义州关卡进口的中国商货严格监督，并征收通关税。

1868年，侍郎延煦等奏接见朝鲜委员，并查勘凤凰、绥阳两边门外大概情形。同治皇帝命恭亲王奕訢会同大学士等共同商议。恭亲王等奏称：“查勘各处私垦地亩，已无大段闲荒，而朝鲜所虑全在民物混杂。欲除混杂之弊，在乎边境之严。”^①恭亲王等会同延煦、奕榕商讨延边一切事宜，并请飭令盛京将军会同原勘之延煦等悉心查办。同治皇帝即派延煦、奕榕驰驿前往奉天，会同盛京将军都兴阿出边查办。皇帝谕曰：“事当创始，必纲举而目始张。且与外藩交涉，尤应禁令修明，方能垂诸久远。前次延煦接见之朝鲜使臣，所设问答，均极明晰，足见国王深明大体。即著礼部传知朝鲜国王，俟报勘定议后，务须严飭令其国边界官，一体遵守。”^②

吉林延边一带为清朝发祥之地，向为封禁区域。1869年，朝鲜咸镜北道六镇（庆源、庆兴、稳城、钟城、会宁、富宁）遭大雨雹，国内饥荒，朝民不顾两国禁令，纷纷越过中朝界河图们江，至珲春诸处谋生，此为朝鲜流民越垦之始。1870年，朝鲜国王称其国庆源府农圃社民李东吉逃往珲春，盖屋垦田，啸聚无赖，吁恳查拿。同治皇帝命吉林副都统毓福密飭珲春协领等购线缉拿，尽数捕获，解交其国惩治。对大批越界私垦的朝鲜灾民，则要朝鲜政府悉数领回约束，并自行设法招徕，严申禁令，不可复蹈前辙。然灾民多不愿复回，吉林地方中国官员亦不忍强力驱赶。这就是

① 《清史稿》(48)，第14595—14596页。

② 同上书，第14596页。

此后中朝关系史上一大悬案——间岛问题的由来。

第二节 中国与朝日江华条约

征韩论出笼

在欧美列强来到东北亚以前，中、朝、日三国共处了几千年，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亚文明。14至16世纪，倭寇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1592—1598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国出兵援朝，前后凡七年，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终于获胜。战后中日恢复通商关系。朝鲜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称朝中外交为“事大”；与日本建立“通信”关系，称朝日外交为“交邻”。

及至近代初期，日本与中、朝两国一样，成了欧美列强侵略的对象，饱受不平等条约之害。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了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国家。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王芸生先生说：“当时的日本，原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与中国、朝鲜友好团结，争取和维持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各自建设近代化国家；另一条是追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同它勾结起来，侵略中国和朝鲜，作欧美侵略者操纵下的鹰犬，以亚洲人打亚洲人。为了亚洲民族的独立和繁荣，日本应该走第一条路。英美等西方国家，都要日本走第二条路，它们扶植日本，帮助它侵略中国与朝鲜，明治君臣就为日本选择了这条路。”^①

日本政府一边屈从于欧美殖民者强加于它的不平等条约，一边侵略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近邻朝鲜和中国。新兴的日本既继承了丰臣秀吉等古代军阀的侵略衣钵，又向欧美帝国主义学得了近代殖民侵略、殖民剥削、殖民统治的全套本领，二者结合，便生出了特别野蛮、特别残酷、特别疯狂的帝国主义变种——日本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页。

的军国主义。

日本幕末时期的思想家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会泽正老斋、吉田松阴诸人，已经露骨地鼓吹侵略朝鲜和中国。吉田松阴是对明治维新影响最大的思想家，1851年，他在《幽囚录》里即主张：“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覲，一如内地诸侯。且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他又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①后来的“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等种种侵略扩张计划，都离不开这些祖师爷的藩篱。

吞并朝鲜，即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明治政府一成立，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人迫不及待地倡导“征韩论”。木户孝允认为，日本如能以兵力开辟韩地釜山，将使亿万人之眼目为之一变，海陆军各种技术将有实际进展。如欲兴皇国于他日，维持万世，除此以外，别无他策。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说：“皇国乃是绝海之一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大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接鞏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若使他国先鞭，则国事于此休矣。且近年来，各国也深知彼地之国情，频繁窥伺者不少，即如露西亚者，蚕食满洲东北，其势每每欲吞朝鲜，皇国岂能有一日之轻却疏忽，况列圣垂念之地焉。”^②

① 吉田常吉、藤田省三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54卷，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193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大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1938年版，第149页。